

【思想文化】

# 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影响

朱文镇,黄平芳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东晋南朝隐士辈出,他们多隐居在幽美的山林之中,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了相对集中的特征。隐士隐居地分布的形成,是由隐士当时的特殊需求决定的。这种分布给当时社会文化及旅游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隐士;隐居地;地理分布;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B235.9;K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4-0003-03

## On Regional Distributions of the Recluses' Living Place and its Formative Causes and Influences in Dongjin and Nan Dynasties

ZHU Wen-zhen, HUANG Ping-fa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It emerged a host of recluses in the time of Dongjin and Nan Dynasties. Most of them lived in beautiful mountains. This showed a relative concentrative feature in regional distributions.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s was decided by the special demands of the recluses, and it caused som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and tourism at that time.

**Key words:** recluse; living place; regional distribution; cause; influence

东晋南朝隐士辈出,他们多隐居在幽美的山林之中,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了相对集中的特征。隐士隐居地的这种分布,是由隐士当时的特殊需求决定的。这种分布给当时社会文化及旅游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探讨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的分布,有助于剖析隐逸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有助于研究分析东晋南朝社会文化及旅游发展的原因。

《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记载统计,这一时代就共有隐士 89 人次(而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这些隐士多隐居在东晋南朝幽美的山林之中,呈现出了相对集中的地理分布特征。下列统计表显示了这一时代隐士隐居地的分布特征。

从表 1 可以看出,东晋南朝隐士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内,但主要集中分布在寻阳、会稽、建康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多在幽美的山林之中。其中隐居寻阳庐山的有 13 人次,占表中所计隐士总人次数的 21.3%;会稽有 8 人次,占有 13.1%,其中

东晋南朝是一个隐士辈出的时代,仅据《晋书》、

表 1 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分布统计表

隐居地	寻阳	会稽	建康	吴郡	湘东	吴兴	南徐	临海	东阳	南海	其它
隐士 (人次)	13 (庐山)	8(南山、四明山、 太平山、若邪山、 秦望山各 1)	7(钟山 5;栖霞 山、方山各 1)	6(虎丘山 3; 瀑布山、吴差 山各 1)	5 (衡山)	4(大涤山 2; 洞庭山、北石 山各 1)	4 (茅山 2)	3 (天台山)	3(金 华 山、九 崖 山各 1)	2 (罗浮山)	6(临川、江陵、宣城文脊山、 长沙临湘山、庐陵三顾山、 建瓯武夷山各 1)
比率(%)	21.3	13.1	11.5	9.8	8.2	6.6	6.6	4.9	4.9	3.3	各 1.6

注:①该表所列隐士仅为《晋书》、《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有确切隐居地记载的该时代隐士。

②鉴于栖霞山、方山当时所属郡县时置时废,且靠近建康,今又属南京地区,故将其计在建康内。

收稿日期:2003-04-28

作者简介:朱文镇(1978-),男,江苏兴化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南山、四明山、秦望山等各有 1 人次;临近会稽的吴郡有 6 人次,吴兴有 4 人次,临海、东阳各 3 人次,其中虎丘山、天台山就各有 3 人次,大涤山 2 人次;建康有 7 人次,占 11.5%,其中钟山就有 5 人次;临近建康的南徐有 4 人次,其中茅山有 2 人次;湘东衡山有 5 人次;南海罗浮山有 2 人次;其他 6 人次则零散地分布于临川、庐陵三顾山、宣城文脊山、长沙临湘山、江陵、建瓯武夷山等地。由此可见,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的分布格局大致是:以庐山、钟山、衡山、虎丘山、天台山、罗浮山、茅山等幽美山林为基点,以寻阳、会稽、建康及其周边地区为三大中心的沿江(长江中下游地区)沿海(东南沿海地区)分布带。

## 二

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分布的形成,实质上是由东晋南朝隐士当时的特殊需求决定的。当时隐士的需求是十分复杂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需求。

第一,遁世。尽管东晋南朝社会相对稳定,但也并不是天下太平,当时依然是势族控权、政治黑暗,政乱、战乱纷起,给当时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仅候景之乱,就使富庶的江南变成了“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sup>[1]</sup>的人间地狱。面对着天灾人祸,许多人苦闷压抑、胆战心惊。为安身保己,逃避尘嚣,他们产生了强烈地遁世需求。而遁世最为理想的一条途径就是归隐山林。正如梁朝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之评论中所说:“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崖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坏开泉,仿佛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挂冠东都,夫何难之有哉。”东晋南朝隐士是迫于没有“见信之主”、“时来之运”的清明环境,而不得不归隐山林的。而山林中“崖壑闲远,水石清华”,非常适合遁世保身、寻求精神解脱。难怪葛洪、陶渊明等一大批隐士在饱尝乱离死亡之苦或仕途失意愤懑时,纷纷走上了归隐山林之路。

第二,审美。永嘉之乱后,一度流行的玄学之风也带到了江南,在东晋南朝盛行不已。玄学是一门庄子哲学<sup>[2]</sup>,因此其核心和基础是老、庄推崇的“道”,其基本精神自然就是老、庄倡导的顺应自然、返朴归真,并且也是“以某种审美态度为指向的”<sup>[2]</sup>。这种精神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时人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酷爱玄学的东晋南朝隐士,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更是充满了强烈地审美需求。他们为了超脱凡尘、陶冶情性,而纷纷归隐凝聚自然美的山林之中。刘宋隐士宗炳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曾“入庐山”、“西陟荆巫,南登衡岳”,遍游名山后,又将山水美景用画描摹下来,用以“澄怀观道,卧以游之”<sup>[3]</sup>,并且撰写了我国第一篇山水画论文《画山水序》,提出了独到深刻地审美理论。又如东晋隐士慧远也具有强烈地审美需求,他原打算往罗浮山,在途经寻阳时,见庐山清静秀美,遂从此隐居于此,30 年足不出庐山。史籍中有关这样的记载实在太多,不必赘述。总之,审美是东晋南朝隐士共同的需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强烈地审美需求,才诱使隐士们不辞艰辛,登山访幽,隐居于幽美的山林之中。

第三,成仙。东晋南朝时,道教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和充实,能完全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因而得以兴盛,影响日益扩大。道教所追求的是长生不老,乃至羽化成仙。要成仙,有两个途径:一是养气服食;二是仙人点化。养气服食,东晋道士兼隐士葛洪认为必经之途就是隐居山林修炼。而要得到仙人点化,也必须到所谓神仙出没的深山幽谷、洞天石府中去找寻。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东晋南朝隐士更是热衷于追求长生成仙,于是隐居于奇山异水,从事养气服食、探寻仙踪神迹之事。在东晋南朝众多的隐士中,为长生成仙而隐居于山林者不胜枚举。如葛洪为了探索道教的神术仙方,曾遍游了徐、豫、荆、襄、江、广诸州的奇山异水,“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sup>[4]</sup>东晋隐士许迈四处寻仙求道,“立精舍于悬崖,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终,“乃遣妇孙氏,遂携其同志遍游名山焉。”<sup>[4]</sup>另如梁朝隐士陶弘景“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尽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后“遍历名山,寻访仙药”,<sup>[4]</sup>隐居于茅山,研究养生之法。由此可见,成仙也是东晋南朝隐士的一种强烈需求,这种需求也为隐士隐居山林带来了不小的诱惑力。

第四,研学。东晋南朝隐士多为学识渊博的学者,从事研究学习是他们隐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东晋南朝隐士潜心研究、笃学不倦,达到了令世人惊叹的程度。如梁朝隐士刘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sup>[5]</sup>又如南齐隐士沈麟士“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手以反故抄写,火

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载十篋。”<sup>[6]</sup>东晋南朝隐士在研究学习的同时,还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如沈麟士、顾欢、吴苞、杜京产、马枢、沈道虔等等皆是。由此可见,东晋南朝隐士具有强烈地研学需求。从事研究学习、聚徒讲学,都需要有一清静、自由的环境。但当时的社会充满了黑暗与动乱,为了便于研究讲学,他们也不得不在于一个清静、自由、开阔、秀美的山林中寻找隐居之地,以满足其研学、审美等诸多需要。如梁朝隐士何胤“以若邪处势迫隘,不容生徒,乃迁秦望山。山有飞泉,西起学舍,即林成援,因崖为堵”,“讲隙从生徒游之”。<sup>[5]</sup>另外,当时“天下名山僧占多”,为了便于与高僧名士交流学习,隐士们更是乐于隐居于这些幽美的山林之中。如刘宋隐士周续之“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慧远”。<sup>[3]</sup>宗炳也曾“下入庐山,就慧远考寻文义。”<sup>[3]</sup>因此,研学需求是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山林的又一推动力。

总之,在东晋南朝特殊的社会环境中,隐士的需求是十分复杂的。他们具有或遁世,或审美,或成仙,或研学,或兼而有之的需求。而幽美的山林则是满足他们这些需求最为理想的场所。在幽美的山林中,最适于遁世,利于审美,便于成仙,合于研学,故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主要集中在幽美山林密集的寻阳、会稽、建康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的沿江沿海地带。以庐山为例,当时隐居庐山的隐士达到13人次,占上表所计隐士总人次数的21.3%,为当时隐士分布最为密集的名山。庐山隐士的密集分布主要是因为庐山具备了其它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最适于隐士遁世、审美、成仙、研学的优越条件:一是庐山依山面湖,风景优美,奇秀甲天下山;二是庐山已成为当时南方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之一,许多高僧名道、文人雅士在庐山建寺造园,阐经释典,著论立说,学术氛围浓厚。由此管窥,东晋南朝隐士的特殊需求对当时隐士隐居地分布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上约略分析了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分布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实际上,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地分布的形成是多重原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它相关因素还有不少,又非以上概括所能全部涵盖。此不多论。

### 三

隐士在东晋南朝社会具有极高的地位,他们以其博学多才、清雅高致的风度赢得了时人的崇敬与仰慕,当时在社会上慕隐之风极为炽盛。如梁朝隐

士何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于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履,恣心所欲,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sup>[5]</sup>又如刘慧斐“尽夜行道,孜孜不倦,远近钦慕之。”<sup>[5]</sup>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远近归慕,赴之如市。”<sup>[5]</sup>在慕隐之风盛行的东晋南朝社会,隐士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时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东晋南朝隐士为遁世、为审美、为成仙、为研学,纷纷隐居于幽美的山林,也在客观上对当时山林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及旅游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晋南朝隐士集中隐居于山林,有利于促进山林的文化建设。这些山林原多为远离尘嚣且充满原始的深山幽谷,但经过隐士们在此论辩学问、唱酬往来、著论立说、聚徒讲学,赋上了浓浓的文化气息,成为了一座座学术活动的舞台,一个个私学教育的基地,许多山林甚至一跃成为了文化名山。例如庐山,在慧远的影响下,聚集了周续之、刘遗民、宗炳、陆修静、雷次宗等一批著名隐士,他们与高僧、名儒、老道一起高谈博辩、唱酬往来,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庐山逐渐成为当时学术活动的中心之一。又如南齐隐士顾欢于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近百人。”<sup>[6]</sup>沈麟士“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开门教授居成市”。<sup>[6]</sup>就连当时的王公贵族、朝士守宰也慕名前往山林听讲,何胤隐居虎丘山讲经论,“东境守宰经途者,莫不必至。”<sup>[5]</sup>南齐隐士吴苞在钟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门焉”。<sup>[6]</sup>梁朝隐士庾承先为荆陕学徒讲学时,“湘东王亲命驾临听”。<sup>[5]</sup>这些山林又成为了当时私学教育的基地。纵观当时隐士集中隐居的山林,几乎无不学术氛围活跃、私学教育兴盛、文化气息浓厚。隐士在山林的集中隐居,无疑大大促进了山林的文化建设。

东晋南朝隐士集中隐居于山林,有利于促进山林的旅游建设。隐士在山林中铺路架桥、建寺造园、聚徒讲学、论辩学问、吟诗作画、游山玩水,不仅发现、开辟了大量旅游景观,而且宣传了山林美丽的风光,扩大了山林的影响,从而促进了山林的旅游建设。如庐山,自从司马迁南登后,才渐为世人所知。到了东晋南朝时,经过隐士与僧道的共同开发经营,顿时声名鹊起,不仅成为了一座文化名山,而且发展成了一座旅游名山。当时以慧远为核心的隐士,与僧道一起,在庐山积极拓寺扩庙、铺路架桥、叠山造园、种花栽树、游赏山水、唱酬往来,为庐山留下了“东林寺”、“简寂观”、“神运殿”、“出木池”、“三笑堂”、“聪明泉”、“虎跑泉”、“白莲社”、“掷笔峰”、

(下转第10页)

特别是楚汉战争时,它的恶果就凸现出来了。因为,历史又一次面临着选择。所谓历史的选择实际上是民心的选择。这时,人们的心理预期决定着人心的向背,而被选择者过去的行为则是人们心理预期的惟一依据。即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政治人物从他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就在民众心目中塑造着自己的形象,都是在拉近或推远着民心。因此,当历史要求人们在项羽和刘邦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就凸现出来,成为人们判断取舍的重要依据,人们将以此为根据,预测他们未来的作为,并作出选择。如果说,刘邦的宽厚,项羽的残暴,在反秦斗争中还没有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巨大作用;在楚汉战争中就已经上升为人心向背的决定因素了。可以说,项羽在反秦斗争中的一系列暴行,已经种下了罪恶的种子,楚汉战争中,他不得不自食

其果了。

#### 参考文献:

- [1]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司马迁. 史记·伍子胥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司马迁. 史记·留侯世家[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司马迁. 史记·秦始皇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司马迁.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司马迁. 史记·项羽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太平御览(卷835)[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 司马迁. 史记·淮阴侯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司马迁. 史记·高祖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司马迁. 史记·陈涉世家[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5页)

“醉石”、“濯缨池”等诸多著名的旅游景观。他们还吟诗作画,热情讴歌赞美庐山,又有力地宣传了庐山美丽的风光,大大提高了庐山的知名度,吸引了更多的游人来此旅游,庐山因而成为了一座旅游名山。又如茅山,本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山林,但著名隐士陶弘景来此修行旅游后,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天,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sup>[7]</sup>经过声名远扬的陶弘景的宣传及开发,茅山顿时成为了道教圣地及旅游胜地了。其它山林如武夷山、天台山、衡山、罗浮山、四明山、大涤山、钟山等,其文化和旅游建设在这一时期也都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也都得益于集中隐居山林的隐士其大力开发建设。因此,东晋南朝隐士集中隐居于山林,在促进山林文化建设的同时,又大大促进了山林的旅游建设。

综上所述,在集中隐居山林的隐士作用下,东晋南朝山林中兴起了文化建设与山水旅游的热潮。山林的这股风气不仅促进了山林的文化及旅游发展,而且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山林隐逸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又必然会在整个慕隐成风的东晋南朝社会不断扩散,甚至在以后的社会传承,山林的这股风气也自然会随之扩散,从而影响当时社会文化及旅游的发展。当时社会出现了“所谈亦不专讲五经,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sup>[7]</sup>学

术活跃景象,私学教育兴盛,山水旅游成风,就连妇女也“游视畋渔,登高临水”<sup>[8]</sup>。在这里,山林隐士起了一定的感染和告示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可以说,在东晋南朝社会里,山林隐士是文化建设的楷模,又是山水旅游的急先锋,在其言传身教的文化传播中、娱情冶性的山水旅游足迹中,无不浸透了他们为中国古代文化及旅游发展流下的汗水。

#### 参考文献:

- [1] 李延寿. 南史·侯景传(卷八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3] 沈约. 宋书·隐逸传(卷九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房乔.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姚思廉. 梁书·处士传(卷五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萧子显. 南齐书·高逸传(卷五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7] 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 葛洪. 抱朴子·疾谬(卷二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 杨彬智]